中国人口科学四十年

陈 功 郭 超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 要: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至关重要。我国人口学研究和人口科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从我国人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人口科学的实践和应用,以及新时代人口科学发展的挑战、机遇和方向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人口科学的成绩和经验和新时期人口科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进行梳理,对人口科学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以推动我国人口科学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新时代国家、社会、人民做出贡献。

关键词: 人口科学;人口学;改革开放;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C 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6-0023-09

人口是国家长足发展的根本。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学研究和人口科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人口科学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初叶,复苏于 1970 年代初,并于 1980 年代初产生"中国人口科学",于 1980 年代逐渐建立学科体系,但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至今仍在发展之中。

一、人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从源远流长的中国人口思想到现代中国人口科学的产生

中国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统计,在古代早已有之,先秦时期的管仲、孔子、孟子、墨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人口数是最早被记录的项目。中国是最早有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就有了正式的有关全国和分地区的人口数字记载。当人们对人口有了数的概念后,基于对人口的关注,自然会产生一系列人口思想。清代洪亮吉(1746—1809)之前,历代人口思想都强调了实力人口和增殖人口的重要性,这是由地广人稀和农业经济形态决定的,因此人地关系是古代人口思想的关注重点。洪亮吉于 1793 年写出了蕴含着宝贵人口思想的《意言》,他注意到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现象,提出的"两个调节"说类似于马尔萨斯的"两个抑制"说,但时间上要早五年。持人口过剩论的还有龚自珍,已经看到浮民和流民问题的严重性,认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根源在于土地兼并。汪士铎认为,太平天国起兵原因是人多地少;主张限制生育,晚婚少育。孙中山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人口潜藏的力量。他反对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来解释中国人口问题,是人口实力论者。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曾留学海外的学者引进西方早期的人口学知识(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①,在个别大学里讲授,并开始了初步的研究,但没有形成气候②。1918 年,陈长衡出版了最早一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中国人口论》),提出中国乱源之病根在于人口过多,一些学者持相同观点。"人满为患论"逐渐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主流声音;他提出"适度人口"思想,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节育。许仕廉认为人口过多引

收稿日期:2018-07-12
作者简介:陈功,湖北大悟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院教授。

① 1906 年《独立评论》发表"论古今生界之竞争"(章宗元文),介绍了马尔萨斯生存竞争思想。1933 年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了郭大力翻译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② 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起生存竞争,也主张节制生育。在当时中国学者看来,中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生育过多和人口过剩(浮民),另一方面是人口品质太低,底层人民普遍营养不良、受教育机会太少程度太低、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导致健康素质不高。陈达认为,欲求生存竞争的胜利,需要控制人口数量同时关注人口素质,提倡优生优育。1940 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经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品质”的政策主张,由于时局不稳而无法实施。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依然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产生了“人口论”与“人手论”之争的人口论战。1954 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得出我国人口 6 亿,位居世界第一。很多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都提出要晚婚、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主张,包括李景汉、吴景超、陈达、陈长衡、孙本文、费孝通、潘光旦、戴世光、全慰天、邵力子、钟惠澜等知名人士。1957 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系统阐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计划生育和提高人口品质的理论和主张,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国家领导人也表示同意倡导节制生育。有些人认为:人有一张嘴但有两只手,劳动力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提出“人手论”。不幸的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很快被 1957 年的“反右扩大化”淹没,人口研究成了学术“禁区”。随着人口论与人手论的学术争论演化为不寻常的政治事件,从而遮蔽了对人口问题的科学认识。

20 世纪 70 年代,实用人口学逐渐兴起,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控制的理论依据。自 70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原理”作了人口学的论证和阐发,从而赋予了“两种生产原理”以特定的人口学意义。1977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人口理论学习班工作座谈会则揭开了人口学界研讨“两种生产原理”的序幕。两种生产理论对中国人口学产生了深渊影响。

(二)改革开放与人口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空前繁荣,人口科学体系在 1980 年代就逐渐被建立并在其后不断完善。回望过去,中国人口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促进了人口学的本土化发展,掌控了中国人口科学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话语权,更是直接推动了我国人口政策的两次重大调整(2013 年单独二孩和 2016 年的全面二孩新政),为人口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近 40 年来,一代又一代人口学者有责任有担当,发表了大量难以计数的优秀科研成果,在人口科学的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和成就,提出有原创性和前瞻性、有解释力和预见力的理论和观点。始于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开拓性研究,通过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中国人口学已然成长为一棵大树,成为国际人口学界不可忽视的学术重镇和一支劲旅。

在人口学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给出了人口科学的定义,概言之,人口科学大致可以理解为: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以数为表、以人口结构和社会互动为经纬的综合性、交叉性人文社会科学,既是人口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也是人口社会学和人文人口学。根据中国学者的观点,人口科学是一个学科体系,包括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学分支学科三个组成部分①。这里的人口理论可以理解为人口公理或者基本原理。人口科学虽然起源于人口变量的统计分析但不局限于此,而是包括了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健康人口学、人口生态学、人口地理学、人口思想史、历史人口学和老年人口学等分支学科。

(三)社会变迁与人口科学的交叉学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许多社会问题发生转变,一些新的社会人口现象随着凸显。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城乡差异化、留守儿童、流动人口健康等问题日益凸显,人口模式也出现老龄化的转变;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人们的生

---

① 邬沧萍主编:《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路遇主编:《新中国人口五十年》,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4 年版。吴忠观主编:《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活环境、生活方式和行为随之发生变化,疾病模式出现了明显转变,也带动了科技文化的进步和发展。80 年代以来,交叉学科在国内经济体制转换的条件下起步和发展起来,在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兴旺发达起来。1984 年,在国务院通过的《关于科学工作的六条方针》中特别提到“自然科学中有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不要搞批判”,这是我国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涉及“交叉学科问题”。1984 年 12 月 16 – 20 日,“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席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和渗透的问题成为探讨的主题之一。1985 年 4 月,在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者的倡导下,“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口号,标志着我国交叉学科时代的到来①。

侧重学科交叉也是人口学的一大特点。人口学虽然以人口为主轴,但是其研究内容经常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健康学、老年学、地理学、生物学、市场营销和政府管理等多门学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许多社会问题发生转变,一些新的社会人口现象随之凸显。由于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许多其他学科中发展成熟的理论逐步被借鉴到解决新兴的、复杂的人口问题中来,形成了不同的交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推动了人口学研究进一步深化,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为人口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统计方法、软件、计算机和编程方法的提升和升级,也为很多人口健康研究内容和目的的实现带来了新的突破。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也导致社会、文化和学术的不断发展。其中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人口科学的实践和应用

(一)人口研究的基础数据收集与应用

1. 人口学基础数据的收集和应用

人口研究离不开人口基础数据的收集与应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政府、学术界、社会各界乃至个人都先后开展了诸多人口基础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各类人口基础数据的特点均不相同,但是如果以数据具有可研究性、数据规模大、数据可公开、数据社会认可度高、数据准确的标准来看,符合人口研究要求的基础数据应主要包含以下几大类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经常登记数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学术界组织的人口和社会调查数据。这些数据的收集与应用对于中国人口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其中人口普查是指搜集、整理、评价、分析和发表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区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以及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资料的全过程。它是在一国政府的主持下,在国家规定的统一时间内,用统一的方法、统一的项目,对标准时点上的全体人口状况进行的全面调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物资条件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与科学决策、筹备下,我国于 1953 年举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人口普查,充分调查了我国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结构等问题,实现了近百年旧中国无法实现的愿望。之后又于 1964 年、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分别开展了第二、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这些人口普查工作的开展已成为我国政府一项重要的工作,国家给予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实现了人口普查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化,人口数据的收集与应用的科学化、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几次人口普查涉及的人口数据更丰富,包含了生育、死亡、迁移等一系列重要人口研究基础数据,为充分了解国情以科学决策奠定了基础。人口普查的基础数据成为人口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也为其他学科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并不断地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经常性人口统计(户口登记)、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是很长时间里,我国取得人口统计资料的三种主要调查方法。随着统计调查方法改革的开展,抽样调查作为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的主体,

① 郑晓瑛:《交叉学科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第 141 页。

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近年来在研究人口问题时,除人口普查外,基本上都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各部门组织的有关老年、妇女、儿童、残疾、流动人口等方面的调查,为了解社会发展和人口动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基础,在各学科也得到广泛挖掘和使用,为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也纷纷组织人口和社会调查,比较著名的如中国健康与营养跟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中国健康退休跟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等。随着我国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提高,这些调查的质量也逐渐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和广泛应用。

2. 基础数据与大数据的整合

随着信息社会的大发展,大数据已成为与自然资源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健康领域每天都产生大量数据,不是以 TB(1TB = 1GB)来统计,就是以 PB(1PB = 1TB)来统计。为此,广泛开展健康大数据研究已成为医院方便患者的现实诉求。大数据已经成为新发明和新技术的源泉。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是数据贡献者,这使得人口数据天生具有大数据属性。尤其是人口健康行业正是大数据应用的重要领域。健康大数据作为大数据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它的应用不仅仅是方面的数据信息,还包括了卫生事业、生命健康数字化储存的海量数据①。作为新兴的应用方向,我国人口大数据发展也面临着数据收集、数据安全、政策制度保障等多方面的问题,有待不断完善和研究。

(二)以问题为导向的人口科学研究

人口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实践对认识各种人口变量的需要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这门科学能为实践需要提供智力支持的程度②。这就要求人口研究应以实践需要或人口问题为导向,人类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都需要加强人口研究。中国的人口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为主,以应用研究为主。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人口学研究的主流是人口研究,而非规范人口学③。20 世纪 70 - 80 年代,曾一度中断的中国人口学得到恢复与发展,其背景是既往过快的人口增长给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政府有着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求,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学科像人口学那样,对国家政策和人口格局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一项对 1977 - 1997 年《人口研究》发表的文章进行的内容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的内容密切联系现实环境和现实问题,体现了科研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为现实服务的特征④。

人口学强调应用性和坚持“应用人口科学”的定位,是指人口学需要在回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寻找发展空间⑤。人口研究只有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学术创新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人口学才能在国家发展中有所作为,并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史无前例。谢宇认为,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教育进步和人口转变。当代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不仅非常显著,而且非常显著,并对未来人口变动和转变带来持续性的影响。21 世纪后,中国人口已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人口变动和人口格局正发生重大转折。未

① 刘芳、卢国强、刘畅:《大数据视角下医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研究》,《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16 年第 6 期,第 170 页。

② 邬沧萍:《人口学在 21 世纪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人口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2—9 页。

③ 于学军:《从人口学的定义看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 年第 6 期,第 10—13 页。

④ 郝红生、陈功:《中国的人口研究与〈人口研究〉二十年》,《人口研究》1998 年第 5 期,第 13—24 页。

⑤ 任远:《对中国人口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第 117—122 页。

来,人口问题将更加复杂,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以后的生育率继续下降,老龄化程度的加快加深,人口红利的减弱,人口迁移流动的作用得到强化,以及人口健康问题等人口问题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加之要认识当前和未来中国的人口和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将中国的人口问题置于它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情境中去理解,人口研究在未来将进一步朝着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

(三)人口科学在人口政策领域的应用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学者们对于人口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争论。很多学者在对中国人口政策的研究是按照狭义的定义。有学者直接将狭义的人口政策定义为生育政策②。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晚、稀、少”向“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后文简称“一孩政策”)的转变,1984 年经过调整后多数农村地区不再执行“一孩政策”。1991 年随着各地计划生育条例的出台,人口政策基本明确和稳定。2001 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表明我国人口政策进入法制化时代。为应对低生育水平挑战,中国自 2013 年开始执行“夫妻双方中任何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个孩子”(后文简称“单独二孩”)政策,2015 年,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执行“育龄妇女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简称“全面二孩”)政策。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生育调节政策经历了从“晚、稀、少”政策,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单独两孩”政策顺利落地,再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随着我国人口科学发展对人口规律的认识能力提高,也是针对我国人口变动特别是生育水平变动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学家建言献策,集思广益,人口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都对人口政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人口科学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的实践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口科学的分析应用范围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中国人口科学以社会发展为目标,将自身的学科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政府决策与民生重大需求紧密结合,在解决重大人口尤其是人口健康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人口健康问题,包括出生人口健康及成人期疾病、残疾的预防和康复、预防和延缓老年慢性疾病的发生及发展,是我国目前及未来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国家重大需求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趋势也是伴随着中国人口的转变进程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学者立足于此,通过学术研究和科研项目,开展了大量人口健康促进实践。

在出生人口健康方面,80 年代后,我国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出生缺陷病因研究和干预策略研究,并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出生缺陷监测,出生缺陷与残疾预防和干预研究阶段,出生缺陷病因的多学科研究阶段。经过多年的探索,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出生缺陷监测初获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医院为基础的全国出生缺陷监测摸清了我国围产儿出生缺陷的种类、顺位、发生率及其地域、人群和季节的分布。这些数据为在中国开展神经管畸形(NTDs)防治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供了确凿的科学基础资料。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在出生缺陷预防干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80 年代开始实施的国家出生缺陷干预工程,使得神经管畸形的发病率大幅下降。利用出生缺陷监测系统收集出生缺陷病例,分析其患病率的三间分布、病例的转归等自然史、治疗史以及手术费用等社会经济数据。而通过多年来对出生缺陷的预防和干预,我国多种重大出生缺陷得到有效预防,出生人口质量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残疾人口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技术

① 张纯元:《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程》,于学军、谢振明主编:《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② 冯立天:《中国人口政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人口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23—34 页。

和公共卫生的发展,也为残疾预防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1987 年和 2006 年,我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残疾人抽样调查。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数据,2006 年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 829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6.34%,相当于每 16 人中,就有一名残疾人。与 1987 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加之人口快速老龄化、慢性疾病和意外伤害增加等因素,我国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残疾人口规模和发生风险,研究估计,我国残疾人每年增加约 200 万,2020 年后每年将以 250 人的速度高速增加,至 2050 年我国残疾人口将达到峰值 1.6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1%。积极开展残疾预防是新时期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公共卫生和人口健康的重要目标。2009 年,中国残联、北京大学联合承担并组织实施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残疾预防对策研究》(09&ZD072),项目集中了国内知名高校和机构优秀的残疾预防、社会学、心理学、康复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我国当前的致残因素、预防对策、工作机制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论证,提出十二五期间以及今后更长时期我国残疾预防的对策。这是做好残疾预防的基础性工作之一。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将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的整体规划,强调解决好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在 2030 年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未来,要继续加强以循证为基础的残疾预防对策研究,进一步总结和研究科学、经济、有效的残疾预防措施。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也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世纪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研究开始步入正轨。以人民福祉、社会发展为目标的人口研究开始将民众深为关切、国家发展现实需要的重大人口问题纳入自身的研究范畴,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一大批优质的、付诸实践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的研究成果。其中,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正是此类优秀成果的代表。诸多人口学者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人口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老年慢性疾病预防与控制、老年人失能和残疾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新时代人口科学发展的挑战、机遇和方向

(一)对人口科学学科体系在社会科学领域发展的重新审视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背景下,我国人口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步入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快速发展期。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需求背景下,在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要求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现实需求下,中国人口科学未来发展的道路上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把握时代的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将人口科学学科建设不断推向完善和繁荣,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1. 国际人口科学发展的态势

当前,国际人口科学发展已经呈现出综合化、精细化、应用化、以及数据匹配与共享的趋势。不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学科交叉与渗透均为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生长点。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日趋频繁,相互间的影响日臻密切,国际人口科学和国内人口科学的发展逐渐趋于一体,相互间联系领域扩大。面对这种发展势头,人口科学在研究视野、研究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上需要不断发展与创新。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借鉴与吸收,对于全球人口科学发展趋势而言,显然不是新的焦点问题,然而对于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来说,却仍旧是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当前,中国人口科学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发展仍旧不均衡,仍需在了解国际人口科学发展趋势的前提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对国外人口学交叉学科的借鉴和学习,逐渐形成学科自身的创新理论和方法体系,并大力发展适用于中国人口发展的交叉学科,在借鉴和学习中推动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与繁荣。

2. 中国人口科学战略地位的重新审视与确立

中国人口科学体系自建立至今近四十年发展

的历程中,始终将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成果应用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为主要任务,开拓了许多创新研究领域,成功地实现了学术研究成果向政策的有效转化,为中国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中人口政策的发展与调整贡献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参考建议。人口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研究的核心要素,因此中国人口科学在当前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越来越凸现出人口科学的前沿性和重要性。未来,人口问题仍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科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领域具有前瞻性战略作用,社会经济的长久稳定的发展需要充分认识人口科学的重要性并明确其统领地位。

3. 未来中国人口科学学科群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思路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是依靠政策做推手,并完全服务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进入新千年后,随着人口科学在理论、方法、实践与应用领域的研究突破,未来学科的发展势必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当前,人口科学的发展还存在很多挑战。人口科学关于理论的探索讨论较为活跃,但建设与发展步伐缓慢;对其他学科的方法论有所借鉴,但尚未形成交叉学科方法论体系;人口科学应用性研究发展迅速,但是未能形成理论－方法－应用共同发展的三角架。未来中国人口科学学科群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应重新审视“人口科学”的学科性质,夯实学科理论基础,坚持实证与思辩并重的研究方法,也应重视人口科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进而实现中国人口科学的学科创新。

人口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复杂而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学科领域的诸多专家学者都贡献出了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党和政府更是高度重视。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出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明确指出了发展与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方向与前景,也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特点、发展的不足和解决的途径和办法,给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人口科学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启示。未来,中国人口科学应在“大人口观”下进行人口科学的学科建设,积极改变人口科学的公众认知,并将学科发展趋势与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学科的未来才有更广阔的天空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新时代人口科学理论与方法创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也对社会人口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口学科的发展必须在基本理论指导的前提下,以人口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反哺理论创新与完善,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前进。在新时代,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要求更加丰富,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也为人口科学方法创新提出了新的目标。区域不平衡问题、心理健康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等新兴的人口问题,提示人口科学的发展需要引入更多的交叉学科方法,以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与创新,为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助力。新时期,微观个体的人将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而宏观上,在人口数量与结构协调发展的同时,人口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也显得更为重要。作为人口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健康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也是全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理念为既往的人口健康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整合思路,也为新时期人口科学研究实践的重点指明了方向。这既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高要求,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大需求,应当成为人口科学新时期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中之重。

虽然人口学注重学科交叉的特性已经被广泛强调,然而其以人口为研究基本目标和范畴的属性表明,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是有着无限可能的。新时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将不仅惠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互联互通与融合发展,也给世界人口学科理论和方法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社会进

步和科技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和概念将会为人口学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创新带来新的机遇。交叉学科政策环境和科学土壤如此良好的大环境更是为人口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人口学应该以最开放的态度不断汲取这些全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养分,以突破传统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的瓶颈。

(三)中国人口科学人才培养的反思与展望

我国人口科学的人才培养历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方人口统计的方法被介绍到中国,中国也有一批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人口的变化规律,人口学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真正形成,也开始注重人口教育和人才培养。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的广泛推行,我国人口学开始了真正的繁荣,人口学科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也正式起航。1979 年开始,一些设立在高等院校的人口学研究机构开始陆续开展人口学学历教育。在人口学研究生和本科学历教育兴起和发展的同时,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的培训,以及对民众人口知识的教育和普及也在一直发展。

经过学历教育的人口科学专业人才的就业状况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密不可分。在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如火如荼的阶段,人口学专业人才需求量巨大,经过系统专业培训的人口学本科毕业生,除一部分考取了研究生在人口学或社会学方面进一步深造外,一般分配到高等院校、各级国家机关和人口统计部门和计划生育部门参加工作。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机构进行缩编和精简,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也被取消。随着市场化的进程,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取向从关注行业背景逐渐转向看重知识面宽的复合型人才,相比八九十年代人口学的繁荣,人口学本科招生和就业都遇到了相当的困难。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科学人才的培养历史,虽然不同阶段人口学表现出了相对的“热”或“冷”,但其实无论哪个阶段中国对人口学专业人才都有着较大的客观需求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基于中国人口及人口问题的现状、中国现有人口相关制度和体制,以及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加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劳动力的流动越来越活跃,人口学人才也如同其他学科人才一样存在着不断流动和转行的问题,需要不断的人才培养以填补由于流动造成的空缺。这些都对人口学人才提出了潜在的客观需求。

然而,尽管存在对人口学人才巨大的客观需求,我国人口学专业人才的供给却并没有表现出来应有的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对人口学毕业生供需结构不平衡的矛盾,即:社会各行业一方面客观上缺乏人口学专业人才,而另一面却往往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人口学相关就业市场也出现了供求错位的矛盾。这一方面是制度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才在市场中实际体现的需求不足的反映。这种供求错位可能包括就业市场对人口学人才的认识不足、人口学人才对市场变化的把握不及时、现有体制对人口学人才培养的重视不够、人口学自身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等原因。

为解决当前人口学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困境,应认识人口科学人才培养的“非独立性”,即指人口学科人才培养不应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是需要其他学科广泛联动,共同参与的;同时,因为人口研究的基础和应用内容都是综合性、交叉性科学,人口科学很难严格地归属为基础学科或应用学科,应理解这种人口科学人才培养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为了推动人口科学人才培养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通过搭建多部门协作平台、整合多渠道社会资本的方式,最终实现打造全方位培养体系的目标。此外,培养能够抓住全球化机遇、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全球化人口学人才,也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给人口学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出的新要求。

四、总 结

中国人口科学作为一门以促进人口全面发展,引导社会全面进步为己任的新兴学科,其兴起与发展的四十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在四十年间,中国人口科学将自身的学科发展与国

家现代化建设、政府决策与民生重大需求紧密结合,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相对成熟的学科。新时代,人口科学的发展还存在很多挑战,也迎来了新的机遇。未来我国的人口科学应继续围绕国家人口与发展领域的紧迫需求和学科自身特点,以国际性研究视角、多层次教学体系、交叉性学科设置、前沿性科学研究的方式,发挥理论研究联系实际、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人口学和其他学科结合的优良传统,把握国际学科动向并服务于新时代国家的重大需求,推动人口科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新时代国家、社会、人民作出贡献。

(致谢: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郑晓瑛、乔晓春、穆光宗、宋新明、裴丽君、庞丽华、武继磊、张蕾、王振杰、吴振东等人对本文均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Forty Years of Population Science in China Chen Gong, Guo Chao

Chen Gong, Guo Chao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China's population issu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he study of demogra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science in China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its socialist modernized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population science achieved in China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population science in the new era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science in China,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population science, and the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of population science in the new era. It is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cademic research and personnel training of popul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peopl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opulation science, demography, reform and opening-up, histor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郑　园)